

荧屏亮点

在温情的反思与戏谑的励志之间,《兰闺喜事》用一个家庭两代女性的人生际遇,呈现了女性意志、女性情感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叙事空间,这个故事,没有宅斗,只有一家人平凡的日常生活;没有大女主的逆袭,只有一群女性在琐碎生活里的向阳追逐。

《兰闺喜事》:轻喜剧成就“另类”古代女子群像

钟玲

一边是市井烟火,一边是宿命姻缘,在欢笑与喧闹的交替之间,一个古代平民家庭里五位女性的挫折与成长,一众小人物的命运转折与人生变革便从开篇走向了落幕……

由刘琳领衔主演,以喜剧方式为主打元素的《兰闺喜事》,从开播起口碑一直表现不俗,令人感到惊喜的是,一部既无流量明星也无著名IP加持的古装轻喜剧,生动演绎出逗趣又温情的合家欢故事,堪称近期热播国产剧里的一匹黑马。

细想之下,原因倒也简单,《兰闺喜事》除了在场景设置、剧情构建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外,一反常规套路的角色设定也很有新鲜感,可谓是这部剧的点睛之笔。

《兰闺喜事》以寡母杜如玉为四个性格迥异的女儿寻找金龟婿的主线展开叙事,剧中对女性群像的塑造起初是这样的——母亲杜如玉精明强势、尖酸刻薄,对“下人”极其苛刻;大女儿春锦荣爱慕虚荣、好高骛远,以高嫁为人生目标;二女儿春佩兰唯唯诺诺,优柔寡断,在家中逆来顺受;三女儿春半夏刻板固执、不苟言笑,不懂人情世故;四女儿春可灵,蛮横无理、随心所欲,以一颦一笑高地厚的心行走江湖。

别说是人设讨喜了,这些女性角色在剧作前期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人设并不太“可爱”。在传统女性群像剧的叙事策略中,女性通常被设定在世俗定义的“好女人”模板中,例如仁厚慈祥的母亲、温柔贤惠的妻子、懂事孝顺的女儿,但《兰闺喜事》却反其道而行之,剧中以杜如玉为首的春家女主人公们,其角色特质几乎是女性典范的反义词,她们以更显著的缺点与弱点来呈现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的,聪慧睿智、慧质兰心、豁达通透……这些普世价值观所认可女性的美好品质,她们似乎都不具备。然而,即便如此,这些看似缺点远优点多的女性角色,却也被演绎得立体饱满、有血有肉,更贴合生活中的市井小民,并与后期剧情她们角色层次的另一面,营造出“恶”与“善”的反转效果,尽管有些角色的反转来得有些迟。

相对任劳任怨的春佩兰、刚直不阿的春半夏,人设极不讨喜的另外两个主要女性角色,都有了质的改变:虚荣的春锦荣,想高嫁的原因只是为了三个妹妹能有丰厚的嫁妆,而从爱慕世子的身份到真心爱上世子本人之后,却能在他邀约她私奔时予以拒绝,全为心中仍有一份对家的责任;整日无所事事做着侠女梦的春可灵,



关键时刻就会化身“护家狂魔”,虽常常莽莽行事却也爱家、爱母亲、爱姐妹……

而杜如玉嘴硬心软的“外表”下,也深藏着对女儿们的深深爱意,全然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爱之绵长。于是,最初仿佛没有多少闪光点的女性角色,都以隐藏在生活细节里的“美德”,一一被“逆转”感官印象——她们,既不是从前貌美而柔弱受男性保护的女性,也不是近年来以“美强惨”为标志的女性,而是具有复杂性性格特征的普通人。

而这些不以“真善美”的人物弧光奠定角色基础所塑造的女性群像,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以反套路的人设完成了

正向的价值观传递:自私自利只是她们外在形象与内在性格交织呈现出来的表象,为家庭敢付出、肯承担才是她们共同的精神内核。

围绕家的责任,《兰闺喜事》所建构的女性群像景观,也在突破程式化创作的性别叙事下,表达了架空历史背景中古代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剧中女性角色自身的独立性、思想性都具有现代女性的特质,无论是她们努力在追求的婚姻自由,还是对于人生之路的清醒规划。例如,年过三十的春锦荣,不惧世俗的压力,不曾将婚姻当作儿戏;春佩兰以人格魅力努力争得与所爱男子路不平在一起的机会;春

半夏一直饱读诗书和学习医者的技能;春可灵则为了不被束缚自由而与四皇子据理力争……

有人坦坦荡荡喜爱名利,有人大胆直爱直面内心,有人热衷“纵马踏花向自由”……可以看到,尽管她们不完美,却在成长中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奋进、勇敢的个性,在不利于女性生存的古代社会选择了由自己掌控人生。

从女性角色的不完美到讨人喜欢,《兰闺喜事》除了让女性角色经历了这样的反转外,还在人物设定上选择了对不同性别的一视同仁。近年来的一些女频剧,热衷于塑造女主角与男主角的角色反差,要么“女强男弱”是常态,要么以男性的不堪衬托女性的美好,而《兰闺喜事》却对男女主角们进行了类似的设定。剧中的男性角色,最初也是一个比一个不着调——有雄心却技能稀松的路不平,“一番操作猛如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勤杂工”;头脑简单、不学无术的凌王府世子,整日研究的是如何攀附皇权;“坑蒙拐骗”为营生的李腾云是以“狗头军师”的形象出现的;天性善良的四皇子,也谈不上有多出类拔萃……真是主打一个公平公正!

当然,这一众男性角色也在剧情的延展中渐渐露出真面目,即便是出场就以反面角色示人的世子与李腾云,真实的内心也是善良的,所谓狠辣只是虚招。

作为一部以女性群像刻画家庭代际与情感关系的古装题材剧,《兰闺喜事》无疑是荒诞与理想共存的结合体,它荒诞在无厘头的喜剧元素弱化了一些剧情的逻辑,却营造出轻松治愈的氛围,它理想在嵌于古代历史背景下的人们其一些行为跳脱了社会环境造成的桎梏。不得不说,剧作依然是精彩的,不仅是人物设定跳出了拘于常规的以优点盖过缺点的狭隘天地,还在塑造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群像的同时,探讨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身为子女对于一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在寻求个人自由的同时,家庭羁绊对于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兰闺喜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亲情线与感情线并行交织,《兰闺喜事》用独特的审美方式和叙事逻辑,描绘出了一幅“另类”古代女子群像图。并且,在温情的反思与戏谑的励志之间,以一个家庭两代女性的人生际遇,呈现了女性意志、女性情感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叙事空间,这个故事,没有宅斗,只有一家人平凡的日常生活;没有大女主的逆袭,只有一群女性在琐碎生活里的向阳追逐。

玫瑰书评



叶萱的身份与视角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她的文字却一如当初,还是那样的温情满满,用最动人的娓娓道来,带给所有妈妈最温暖的心得分享。

丹玉

“孩子,相比做学霸,我更希望你们懂得玩耍。因为,那是活生生的世界,而不仅是书本里的平面道理。也是你们,活色生香的未来。”这是作家叶萱在她的家庭教育文集《和孩子一起玩,是最好的陪伴》中最吸引我的一段话。因为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对“玩”字仍然是表意上“不务正业”的理解,但读完全文才知道,叶萱老师想要阐述的“快乐学习”,不是为了快乐而放弃学习,反倒是把学习化解成为家庭内部的游戏,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实现全家人的一起学习、相互陪伴、彼此启发。当求知与探索成为生活中的习惯,那么“懂得玩耍”的那个孩子,就渐渐成长为一个丰沛又快乐的人。

从百万畅销婚恋小说到家庭教育类图书,从公务员到大学教授,叶萱的视角与身份都发生了改变,但她的文字却一如当初,还是那样的温情满满。是诚意十足的推心置腹,而不是家教类图书里常见的训诫——不得不说,教科书式的家庭教育理论分析其实是有知识理解门槛与具体执行门槛的。相比而言,《和孩子一起玩,是最好的陪伴》不仅有温暖的亲情故事,更是兼顾情感分享与亲子教育,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教育道理、提供可以模仿借鉴的沟通方法,真是一本非常具有实用性的“育儿手册”了。

尤其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叶萱在这本书中分享了许多“家庭学习小组”的组建经验——显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二孩”甚至“三孩”,这本书的实用功能就更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晚自习,我们的夜生活》一文,通过每天晚饭后把餐桌铺上桌布一起学习,不仅潜移默化培养了大宝的学习习惯,还让二宝也产生了对学习的向往,特别期待自己也能加入“晚自习”这么神圣的家庭活动中。以及,在这样一起安静学习的夜晚,爸爸妈妈也在桌边阅读、写字,是全家人相互陪伴的好时光,更是家庭内部共同进步、共同求知的好氛围。

也是在这本书中,婚恋小说作家出身,如今在高校从事性别研究相关工作的叶萱老师,将亲子陪伴的意义扩展到了家庭陪伴、婚姻陪伴的多个层面。是的,父亲对于儿童成长陪伴活动的有效、专注参与,是对家庭生活的负责,也是对婚姻关系的尊重。也难怪,购书时看评论区说有读者买这本书看完后,还专门把它包装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朋友、配偶——开放视角下,一本家庭教育类图书的意义,不仅仅是方法的借鉴,更是思路的可打开,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也完成了对个人、家庭观点的优化。

这不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但幸而,我刚好遇见了它。它用真挚的故事、恳谈的风格,缓解了我的焦虑——幼升小的分离、养育过程中的困惑、与家人有了养育矛盾怎么办……都是第一次做妈妈,难免磕磕绊绊,偶尔也会疲惫难过。就像叶萱老师说过的:“要谢谢‘做妈妈’这件事,让我们可以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蹲下身,再体验一次童年,再做回一次孩子。”

成长很慢爱却很长,如果说和孩子一起玩儿是最好的陪伴,那么和孩子一起成长,应该就是对孩子甚至对我们自己而言,最好的爱吧。

和孩子一起成长,就是最好的爱

文化观澜

《她的城》:都市女性的自我言说和勇敢破局



苏展

近年来,塑造女性群像成为电视剧的收视密码之一,不久前收官的《她的城》,也以女性群像的故事引起了一定关注度。

《她的城》讲述了“北清大学”毕业的“大厂”中层李英男、富商太太艾英、律师英小美三位一起成长的校友在南方大都市的奋斗和生活故事,她们的身份各有代表性。饰演主角的三位女演员在演技上带给观众不少惊喜,十分契合为当代女性书写的“大女主”叙事。所谓大女主之“大”,不仅体现在三位女主角在事业领域不断上升的路径,更在于她们不断破局、破壁,打破既往的观念对她们约。她们作为“城”的主体,不断以主体的口吻言说自己的故事和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城”命名就显得尤为巧妙。“城”是剧中主人公们所在的城市,大都市往往被视为现代生活最典型的组织形式,一方面,现代生活节奏稳定、分工明确,在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对个性发挥有所限制。而《她的城》向我们展现了“城”的另一面。在这里,“城”真正成为女性活动的场域,女性则是活生生的社会生

活建构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

当然,即便在“她的城”中,三位女主角依然面对以往影视剧对女性不断提出的、观众也无比熟悉的难题: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虽然应对这个问题的策略各不相同,但本剧中的女主角们给出的都全然是不同于以往影视剧中的坚持、周全、隐忍等答案。

在传统叙事中,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存在矛盾隐藏着一个必然的预设,即女性主要承担家务、养育等家庭工作,并且,女性所承担的家庭工作和她的社会发展是互不相连、彼此冲突的反面。而在《她的城》中,我们可以发现,创作者试图打破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切割。比如,艾英不仅仅在丈夫的生意中承担着很强的公共协调职能,亦为企业家丈夫出谋划策、提供情绪价值,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职务的公司高管。并且,艾英试图在丈夫事业的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出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而这种尝试却被丈夫所警惕,也成为她遭遇丈夫的背叛、陷害的原因。

身为大公司中层的李英男,既是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又是家里在经济和决策上的“顶梁柱”,而她也一直在这样的身份中

找到乐趣和价值。年轻却卓有成绩的律师英小美,对女性困境的“破局”方法是专注事业。三位女主角的“破局”办法各有不同,但妙处都在于,她们生活的可能性是充分敞开的,身份、定义、价值都是流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在家庭中找到价值的艾英和李英男结束了婚姻,“单身贵族”英小美却和年轻的偶像歌手谈起了一段“非常规恋爱”。可以说,三位女主角和她们伴侣之间的关系,皆不存在传统的有明经济、地位、观念差距的角色划分,他们的关系回归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平等配合中流动地构建。

该剧的另一个亮点是女性自我表达的直陈——“她”,真正成为叙事的主语。电视剧开场即以李英男的第一人称叙述展开,直接呈现女性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创作者以第三人的视角,带着观众从外在视角对女性角色进行观看与评价。而女性角色的内心感受皆是她们对生活、职场、人际关系等最真实的经验,使观众在不加转述的自我袒露中达成对剧中人物的共情。

剧中这些价值性的表达很密集,但并不显得刻意和生硬。这种自然流表的

这首先基于剧中女性形象的立体塑造。从世纪之交最受欢迎的偶像剧,到近年来集中进行类型化尝试和突破的职场剧中,都市精英的形象往往是丰满却扁平的:他们往往受到良好教育且充满智慧,足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复杂情况,一定的财富又使他们摆脱了现实中柴米油盐的烦恼。然而,李英男应对职场霸凌所表现出的懦弱、英小美对于爱情的犹豫和退缩等,这些真切的、看起来不够潇洒的感受,都使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显得更有血有肉、贴近现实。

同时,剧中对现代人境遇的讨论远不局限于三位女主角本身所遭遇的事件,而是指向了更为普遍的、共性的个体人生体验。比如对现代人职场压力、年龄焦虑的探讨,都能广泛地引发观众共情。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她”不仅是言说的主体,更是言说的主体。在画外音的表达中,三位女主角不仅有独白,更是频繁地以对话交谈的形式表达她们对人生、对世界、对女性处境的想法,成为这部剧塑造女性友谊的独特方式。在观点的碰撞中,她们不断深化着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专属于女性群体内部的你一言我一语,也成为她们不断进行自我探索、突破困境的重要路径。

可见,以《她的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群像戏在不断努力探索女性关系的更多面向。当下的女性群像戏依然多为都市女性的群像戏,在广泛的女性群体中,她们拥有更多的文化与经济能力去排除生活的难题,从而进一步探讨女性的境遇和出路。那么,小镇女性、乡村女性是否能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找到更有效的言说出口?这或许是未来女性群像戏创作需要关注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讲师,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中国当代媒介形态下的文化意见表达”项目编号:22YJ050002)项目成果)

资讯

关注超越性别的情绪劳动

——《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社会多么不重视情绪劳动,只要看妈妈不在家时有多乱,人们对服务业行业有多苛责,就明白了。”

1983年,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中首次提出“情绪劳动”这个概念,以空乘人员、记账员等为中心考察人类情绪商业化的现象。她在20年后的新版后记中说,对情绪劳动的研究应该增加家庭与性别的维度。2023年8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由吉玛·哈特莉的新著《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她以霍克希尔德的理论为基础,将情绪劳动的定义进一步扩展到“为了让每件事情顺利运转而承担的无形精神负荷”上来,揭示了传统企业规训下的情绪劳动,呈现出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面临的困境。

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萍、北师大学术部安超、艺术家周雯静与媒体人青青子共聚郎园图书市集,从情绪劳动的定义与自身体验出发,对本书的主题进行了研讨。三位嘉宾谈到“情绪劳动”这一概念的提出,能让大量付出此类劳动的人们被看见。

比起“情绪劳动”,安超更喜欢“情感劳动”这一概念:“比如我所在的教育领域,中小学教师、幼师(尤其是女性教师)是情感劳动非常密集的群体,这个概念可以为他们在经济、社会乃至法律领域赋权。”

而在安超看来,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情感劳动还有很多。“比如在家庭中,隔代抚养孩子的老人群体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职场里的情感劳动,比如酒桌上因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衍生出的敬酒文化,以及女性遭遇的职场歧视都包含对情感劳动的忽视。”

在青青子看来,情绪劳动的承担者多是从服务业的基层劳动者,比如家政工、小时工、保洁员、服务员等,而且它不仅有关情绪的管理,也是对身体“非常密集的控制”。就像霍克希尔德在书中提到的,空乘人员不仅是要面带微笑,Ta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也要严格管理。”

在这本书中,作者吉玛·哈特莉认为,女性承担着更多的情绪劳动,但情绪劳动不应该被仅仅视为女性议题。几位嘉宾也认为,这是一个超越性别的议题,而且涉及众多弱势群体。

正如该书所说,每个人都是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受害者,从负面的情绪劳动中解脱出来,不仅关乎女性,而需要不同性别、不同群体的互相理解与联合。